

混沌中的秩序：现代主义在《喧哗与骚动》中的体现

刘宣辰

苏州科技大学 2022 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

摘要：本文探讨了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分析其独特的叙述结构和心理描写如何反映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混乱与无序。文章分析小说里意识流叙事和多重视角的运用，揭示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家庭的衰败。同时，探讨家庭与社会的崩溃、人性困境及荒诞感等主题，展现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与无意义的生存体验。通过对这些主题的深入分析，本文强调了《喧哗与骚动》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

关键词：现代主义、意识流、多重视角、孤独

现代主义文学作为 20 世纪初兴起的重要文学潮流，打破了传统叙事规则，强调通过形式上的创新来揭示人类内心的复杂性以及现代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便是这一文学趋势的重要代表作，作品通过独特的叙述结构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深入探讨了时间、记忆、人性与家族衰败等核心主题。在福克纳的叙述中，时间并非线性，而是碎片化、交错的，这种非线性叙事不仅揭示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也反映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所面对的混乱处境。正如标题所示，“混沌中的秩序”揭示了在表面无序的生活中，角色们艰难寻求理解与意义的过程。尽管故事充满失落与绝望，福克纳通过细致的描写和深刻的心理分析，使读者得以辨识其中潜藏的秩序与内在逻辑。本文将通过对《喧哗与骚动》的深入剖析，进一步阐释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在该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一、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

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深受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社会、文化和科技多重因素的影响。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剧变，传统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个体的存在感受到巨大的威胁和动摇。文学作品开始反映出人类在这一混乱时代中的困惑与不安。

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主义文学不再追求客观现实的简单再现，而是强调个体主观体验的独特性，旨在揭示内心深处的感受与矛盾。作家们如同探索者，勇敢地迈入复杂而未知的心理领域，力求通过语言的变形与时间的扭曲来呈现心理活动的真实。福克纳正是这一探索的先锋之一，他在《喧哗与骚动》中运用意识流技巧和多重视角，将人物的内心冲突与家庭的衰败呈现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在混沌的叙事中感受

到潜在的秩序与意义。

二、《喧哗与骚动》中的现代主义特征

（一）意识流叙事的运用

《喧哗与骚动》中，意识流手法是最显著的现代主义特征之一。这种手法试图呈现人物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动，而非遵循逻辑与因果关系的线性叙事。班吉的叙述部分即是典型的例子。班吉是个白痴，时间对于他而言永远只是当下，没有过去或者将来。他的感知与记忆以跳跃且无序的方式出现，事件片段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无缝切换。班吉无法理解情境与因果关系，但他对某些象征性细节的执着（如凯蒂的“树的气味”）反映出他对家庭情感的深层感知。

班吉的意识流视角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方式。因为他是个智力低下者，家族中的人不会在他面前掩饰自己，反而毫无保留地显露出真实的性格。班吉仿佛成为了一面“道德镜子”，让家族成员的真面目展现在读者眼前。这种不加修饰的视角，使读者从小说开篇便能对家族中的种种事件形成较为客观的印象，从而更为公正地评判其中的人物。

福克纳通过班吉的意识流叙述，深入揭示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影响。人物的思维如河流般自发流动，读者不得不穿梭于班吉的感官世界中，重新拼接被打碎的情节。意识流手法不仅呈现了人物内心的混乱，还打破了传统小说对逻辑叙事的依赖，使文本充满了心理的真实与复杂感。

（二）多重视角与叙述的不确定性

福克纳通过多重叙述视角，挑战了传统叙事中对客观真相的追求，展示了主观性在叙述中的重要地位。在班吉、昆丁和杰生三人的叙述中，他们用各自的方式看待现实，因而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现实中，也无法将现在的处境与过去的事件衔接起来。尽管他们围绕同一家族展开故事，但每个

人的视角都带有明显的偏见与局限。班吉的视角是感官化的，昆丁的视角充满了焦虑与失落，而杰生的叙述则因自私与愤怒而扭曲。福克纳将这种多重视角的交错叙述，比喻为一场叙述的拼图游戏，使读者在碎片中寻找真相，也奏响出一曲南方家族没落的无尽挽歌。

这种不确定性反映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核心理念，即真相本质上是多元且不可知的。多重视角的设置不仅揭示了人物内心的孤独感，也象征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读者在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叙述时，必须主动参与解读，而不再是被动接受作者的权威叙述。这种互动使得《喧哗与骚动》成为一部极具开放性和多义性的文本，打破了传统叙述的稳定结构。

三、主题解析：现代主义思想的呈现

（一）时间与记忆的迷宫：个体困境与自我认知的崩塌

《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的叙述呈现了时间作为一种压迫力量的象征，他代表了“迷惘的一代”中挣扎的青年形象。“他几乎病态地执着于康普生家族的荣誉和南方的清教贞节观念。”他对时间的抗拒通过毁坏父亲的怀表得到体现，“昆丁拧开怀表，取出指针，使其无法再显示时间，但内部的齿轮依然无声地运转着。”这一行为虽然试图象征性地中断时间对他的束缚，却无济于事，反而加深了他内心的绝望。时间的流逝并不会因为怀表的停止而停顿，正如昆丁内心的痛苦无法通过逃避或抗拒而消解。怀表的毁坏象征着他与时间、现实的彻底决裂，并预示了他最终走向自杀的必然结局。福克纳通过昆丁的绝望揭示了现代人面对时间的无力感：时间不仅无法掌控，还成为个体自我认知的负担与精神上的沉重枷锁。时间的扭曲与错位不仅是叙事的手法，更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具象化，暗示了现代人面对社会巨变时的无所适从与深刻迷茫。

（二）家庭与社会的崩塌：传统价值观的瓦解

《喧哗与骚动》通过康普生家族的衰败，象征了南方旧贵族家庭和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崩塌。康普生家族曾代表南方社会的荣耀与秩序，但在工业化、资本主义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家族内部关系开始瓦解。凯蒂的性自由不仅被家族视为道德败坏的象征，更揭示了传统家庭伦理在现代性挑战面前的脆弱性。昆丁对凯蒂失贞的无法释怀，反映了南方社会对女性贞洁和家庭荣誉的高度依赖。然而，凯蒂的反叛揭示了女性对传统性别束缚的挣脱，她的选择成为家庭解体的导火索，也标志着旧价值体系的瓦解。

杰生的角色代表了家族衰败后的冷酷与物质化倾向。他对凯蒂和外甥女的仇恨，以及对金钱的贪婪，暴露了家庭内

部关系的彻底崩溃。在杰生的叙述中，家庭不再是情感的纽带，而是充满算计和控制的场所。福克纳通过这些人物的复杂关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家庭伦理的解体，也探讨了工业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康普生家族的瓦解不仅象征了南方社会旧有荣光的终结，还折射了现代人在传统价值体系崩解后的身份危机和精神困境。

（三）人性困境与荒诞感：孤独与无意义的生存体验

《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物各自陷入内心的困境与孤立状态，展现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荒诞性生存体验。班吉因智力缺陷被孤立于家庭之外，他无法理解复杂的社会规则，却本能地感知到家庭关系的变化。班吉的无辜与沉默使他成为家族衰败的象征，仿佛他自身的存在就是家族命运的无言见证。昆丁的绝望和自杀显示了他在现实与记忆之间的撕裂，这种内心冲突不仅是个体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转型期普遍的精神困境。

杰生则体现了另一种荒诞性：他完全沉浸于愤怒与仇恨之中，对家庭成员充满了敌意，最终丧失了情感能力。他的自私和冷酷展示了人在物质主义社会中的精神枯竭。在福克纳笔下，这些人物都无法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他们被困在自我中心的孤岛上，无法逃脱自身的痛苦。这种荒诞感与存在主义的思想相呼应，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无意义与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性。

福克纳通过这些角色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精神危机：每个人都深陷在自我的牢笼中，不断挣扎却无法逃脱。这种生存的荒诞感不仅反映了卡夫卡式的孤独与无助，也映射了现代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时的焦虑与绝望。

（四）性别焦虑：女性形象的多重解读

凯蒂作为《喧哗与骚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她的叛逆则展现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对传统性别束缚的反抗。她的选择打破了家庭对女性纯洁与顺从的期待，但也因此被家族和社会排斥。凯蒂的形象复杂而多面：她既是传统道德的破坏者，也是现代女性自我觉醒的代表。凯蒂的反叛不仅是对家庭的背离，也是对南方社会男权结构的挑战。班吉对她香水气味的排斥，隐喻了南方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控制与审判。班吉只接受“闻起来像树”的凯蒂，而她一旦超越了这种自然状态，便被视为“异类”。这种期待反映了南方社会对女性的严格束缚：女性必须符合某种纯粹的自然形象，一旦违背，即会遭到厌弃与排斥。

凯蒂选择婚姻和放纵，并非出于真正的爱，而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然而，家庭和社会的冷漠使她逐渐走向绝望，

最终成为一个“在混乱世界中四处游荡的妓女”。凯蒂在追求个人幸福时的失败，象征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失去自我价值后的精神虚无。

福克纳通过凯蒂的故事探讨了性别角色的转型，揭示了现代社会在性别解放过程中的矛盾态度。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性别议题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对男性与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身份困境的深刻反思。在《喧哗与骚动》中，凯蒂的存在不仅代表了女性自由的觉醒，也展示了这种自由所带来的代价与冲突。

（五）基督教原型结构：凯蒂与夏娃

《喧哗与骚动》整部作品的结构是基于基督受难的原型之上。谈及作品的创作时，福克纳说：“开始只是我脑海里有个画面。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画面是很有象征意味的。画面上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的 裤子、屁股上尽是泥，小姑娘爬在树上，从窗子里偷看她奶奶的葬礼，把看到的情形讲给树下的几个弟弟听。”这个小女孩便是凯蒂。尽管小说中没有凯蒂的直接叙述，她却成为三个兄弟内心冲突的核心，承担着作品的中心主题。

如果说人类的堕落源于夏娃，那么在昆丁和杰生眼中，康普生家族的衰落同样归咎于一个女人——凯蒂。她的堕落直接导致了昆丁的自杀和家庭的解体。在奶奶去世的那天，凯蒂爬上大树窥探家中的秘密，恰逢“蛇从屋底爬出”的情节，这一细节与夏娃受蛇诱惑偷食禁果的故事产生了隐喻的共鸣。通过这些暗示，福克纳呈现了凯蒂作为夏娃的化身。

在昆丁和杰生的视角中，凯蒂是万恶之源，她使他们失去了原本宁静的“伊甸园”。然而，福克纳赋予凯蒂更为复杂的内涵，视她为“母亲的夏娃”，赞扬她的牺牲精神和面对生活挫折时所展现的勇气与坚韧。凯蒂的爱与奉献成为维系康普生家庭的脆弱纽带。她透视了母亲的神经质和父亲的悲观，决意反抗虚伪的社会，试图寻找逃离康普生家族的方法。然而，她所选择的路径却是错误的，最终陷入了性解放的深渊，沦为纳粹军官的情妇。

凯蒂的心理、审美和道德上的失落，象征着福克纳作品中南方传统的崩溃。她的堕落不仅是个体的悲剧，也是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崩溃的深刻反思，彰显了现代主义文学对人性复杂性的探索。

四、《喧哗与骚动》中的语言创新与现代主义叙事探索

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以叙事结构与语言的创新，深刻展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追求。通过语言的异化与象征性表达、叙事空白的制造、多层次叙事的交织，以及叙述

不连续性的呈现，他构建了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多义性的文本。这种叙事实验不仅挑战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还邀请读者积极参与解读过程，探索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与社会的深刻转型。福克纳的语言与叙事创新不仅是对形式的探索，更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刻反映，展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

（一）语言的异化与象征的深度运用

在《喧哗与骚动》中，语言不仅承担信息传递的职能，更成为解构人物思维与探索情感复杂性的实验工具。福克纳通过刻意打乱语法和句法结构，使叙述脱离标准语言的束缚，从而呈现出一种“异化”效果。这种语言异化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表达逻辑，也使读者直接面对人物扭曲的心灵状态。尤其在班吉的部分，语言如同未经过滤的思维碎片，跳跃且断裂。这种不连贯性将班吉的认知局限与内心困惑生动展现，强化了读者对其感官世界的沉浸体验。

此外，象征性语言在小说中的运用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福克纳采用符号与隐喻表达潜藏的情感与观念。例如，水的意象频繁出现。凯蒂每次外出与人约会回来，班吉都要哭喊着拽她去洗澡，目的是让她洗涤身上的污秽以便能重新散发出“树的香味”。在昆丁的叙述中，水暗示着他渴望净化与救赎的无望心态。“河一定就在那个方向，舔着创伤流向大海，通向安宁的洞窟”。当昆丁得知妹妹凯蒂失贞后，他痛苦不堪，自认为活着没意义，只好跳河自尽以维护其所谓的名节。这些象征不仅丰富了叙事的层次感，还赋予了语言以情感的重量，使之成为解读人物心理的钥匙。

（二）语境缺失与叙事空白的制造

福克纳在小说里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故意制造语境缺失和叙事空白。这些空白打破了读者对连贯情节的期待，形成一种断裂感与不确定性。人物在叙述中经常省略重要的背景信息或事件发展脉络，迫使读者自行填补这些空缺。例如，凯蒂的重要事件多次出现在班吉、昆丁和杰生的回忆中，但小说从未直接描写她的完整经历。读者只能通过不同叙述者的片段化描述来重构凯蒂的形象。这种叙事空白不仅增加了阅读的难度，更揭示了人物各自认知的局限性，凸显了叙事真相的不可知性。

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挑战了传统文学的叙述连贯性，还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开放的艺术”。通过空白与缺失，福克纳揭示了语言与叙述的局限性：语言无法完整地还原经验，而叙述者的视角也永远无法穷尽事件的全貌。这种刻意的空白营造出一种张力，使小说中的沉默与未言成为理解人物内心冲

突的重要线索。

五、现代主义文学的延续与《喧哗与骚动》的深远影响

《喧哗与骚动》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福克纳在非线性叙事、多重视角及叙述不确定性上的探索，被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发展，强化了文本的多义性与解构特质。心理小说和存在主义文学也从福克纳的作品中汲取灵感，通过深入刻画人物内心，揭示了个体在社会转型中的孤独和迷茫。

此外，福克纳对美国南方社会的描绘丰富了南方文学传统。他通过解剖家庭关系和文化断裂，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危机与伦理崩塌，为后续作家如卡森·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等人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灵感。

福克纳的叙事革新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框架，更深刻反映了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他通过意识流和时间的重构，展示了人类在混乱与孤立中的挣扎，使《喧哗与骚动》成为

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现代主义文学虽兴起于20世纪初，但其思考和创新对当代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它促使我们通过多元视角与艺术探索，探寻个体体验与人生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钱中丽.《喧哗与骚动》中的圣经传统[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03): 78-81+159.
- [2] 师蕾.《喧哗与骚动》中班吉意识流的艺术特征[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04): 98-100.
- [3] 钱中丽.《喧哗与骚动》中时间的意义[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 (01): 115-118+174.
- [4] 王玉括. 凯蒂的女性身份与“男性目光”[J]. 当代外国文学, 2003, (02): 129-133. DOI: 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03.02.019.
- [5] 周文娟. 人性的异化——《喧哗与骚动》人物悲剧的创作根源解析[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02): 88-91.

